

戴联斌

著

FROM 从 书籍史
HISTORY OF THE BOOK

到 阅读史

TO HISTORY OF READING:

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HISTORICAL STUDIES OF READING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戴联斌
——
著

FROM 从 书籍史
HISTORY OF THE BOOK

到 阅读史

TO HISTORY OF READING:

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HISTORICAL STUDIES OF READING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 戴联斌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133-2474-8

I. ①从… II. ①戴… III. ①图书史—研究—世界②阅读—文化史—研究—世界
IV. ①G256.1②G25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8693号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戴联斌 著

责任编辑：汪欣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一千遍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5

字数：218千字

版次：2017年3月第一版 2017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2474-8

定价：4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

新人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

文之间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容易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于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尊严，唤起内心力量，促进个性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公正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目 录

致谢	001
则例	003
序言（安·布莱尔）	005
引言	009
脱困第一	022
论人第二	029
说史第三	041
划界第四	051
设问第五	066
立规第六	074
取材第七	092
琢玉第八	115
著说第九	136
赘语	163
参考文献	170
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	189
索引	205

图版及示意图

图 0-1: 书籍的三要素及核心 (见第 12 页)

图 0-2: 让·博丹《天地法则》拉丁文原版书影 (1596) (见第 20 页)

图 1-1: 查禁与阅读自由 (1820) (见第 24 页)

图 3-1: 印刷术与英国文艺复兴 (1741) (见第 44 页)

图 4-1: 书籍史是历史学、目录学和文学结合的产物 (见第 52 页)

图 4-2: 书籍的传播循环 (见第 53 页)

图 4-3: 书与社会经济环境 (见第 57 页)

图 5-1: 书轮 (Daudet 绘刻) (见第 68 页)

图 5-2: 书轮 (王徵摹绘) (见第 69 页)

图 6-1: 卷子装和册子本 (见第 77 页)

图 6-2: 美国公理会差会达科塔教团报告 (见第 87 页)

图 7-1: 华兹华斯私人藏书目录 (见第 96 页)

图 7-2: 法国贵族夜读《圣经》图 (见第 101 页)

图 7-3: 洛克《书钞新法》(1706) 书影 (见第 104 页)

图 7-4: 汉考克书钞手稿 (见第 105 页)

图 7-5: 鲍斯韦尔《萨缪尔·约翰逊博士传》(1807) 皮奥兹太太批本 (见第 107 页)

图 7-6: 十八世纪英国乡村读书会 (见第 111 页)

图 8-1: 《哲学家》扉页 (见第 118 页)

图 8-2: 《哲学家》插图 (见第 119 页)

图 8-3: 贺兰勋爵家藏书室 (见第 131 页)

图 9-1: 妇人伴书慵睡图 (见第 140 页)

图 9-2: 连写抄手卷 (见第 144 页)

图 9-3: 福克斯《殉道录》(见第 147 页)

图 9-4: 谷腾堡印本《圣经》书影 (见第 152 页)

图 9-5: 十九世纪英国的阅读公众 (见第 159 页)

致谢

这本小书，起初并没有照着一本书的模样写，不过是一份很长的读书报告，目的不外总结一下自己对欧美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研究，尤其是阅读史（history of reading）研究的认识，以为日后的参考。读者最初也只有卜正民（Timothy Brook）师和魏希德（Hilde De Weerd）师两人。他们当时督导我的学业，不得不读这一百多页的文字，虽然不希望我在别人的园子里泡得太久，还是很乐意见到从外面耘获的收成。但我的决意把它变成一本小书，还是受了朋友的启诱，而且自己也许了诺，于是就有了动力，持续改写了几年。

从一份专业报告到一本书，从英文到中文，从为我的教授写到为非专业的朋友讲解，这中间需要做很多改动。读书报告本来是有系统的；在写这本书时，我调整了原来的结构体系，又细分了章节。更多的改写则涉及知识背景和行文风格。欧洲的历史以及形形色色的相关理论，对许多中文读者或许比较陌生，我在改写时尽量加一些简短的介绍。至于行文，彻底改变枯燥的学术写作风格，尽可能使用口语，力求清晰、简洁，就像冬夜与朋友站在厨房闲聊时讲到专业问题一样。

原来的读书报告，是在2008年夏天完成的，但我接触欧美书籍史和阅读史是在2004年，当时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求学，英文系的韦熙（Mark Vessy）教授带我入门。后来随卜正民师转到牛津，我仍然关注这个新兴的领域。牛津丰富的藏书满足了我的阅读需求，我特别感谢波德林（Bodleian）图书馆、历史学部（History Faculty）图

书馆和泰勒研究所 (Taylor Institute) 图书馆。史恺悌 (Catherine Swatek) 师，还有张海灏 (Desmond H. Cheung) 博士和张德伟博士都浏览过报告，给我鼓励。

全书中文初稿在哈佛改定。我在这里开设中国书籍史讨论课，学生很少，但他们的的问题很多——我很感谢。为了推动讨论，我重新思考相关的理论问题，包括“书籍”和“书籍史”的界定，其中一些在读书报告里谈过，我觉得有不足，就回头做了修订和补充。哈佛的安·布莱尔 (Ann Blair) 教授、普林斯顿的安东尼·格拉夫敦 (Anthony Grafton) 教授，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和我讨论过关于书籍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对我多有启发。

读书报告是在泰晤士河边的一间小公寓里完成的，两个月后儿子出生。真正动笔用我的母语写这本书，是在盐泉岛 (Salt Spring Island)，时间当在 2011 年 12 月，不久女儿出生。如今书稿完成了，却是一人羁留在查尔斯河边。米盐寝席，雨丝风片，谗论私语，苦泪怡情，都见证了这本小书，也都糅进了这本小书。床头的微笑，桌边的细语，温软的手，光润的脸，姗姗的步，铭心刻骨，溶在血肉里，从离岸小岛，到菲莎河谷，从悠长的海堤，到迷眼的草甸，从多雨的温哥华，到寒冷的波士顿，随我一路走来，陪我挨过困窘和孤寒。身无长物；这本小书，得益于心中这阳光的滋养，也是献给这阳光的礼物。

戴联斌

2014 年 4 月记于麻省水镇

本书出版，得到了刘丽华、陈卓、孙志鹏、李建安和汪欣的支持。舍弟联海代为办理琐事。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亨廷顿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都灵大学图书馆、巴黎工艺美术博物馆和美国公理会差会授权使用书中书影和图像。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这本小书不会面世。

2016 年 10 月补记于埃德蒙顿

则例

注释。这本小书文献来源多。为节约篇幅，注释尽量简化，仅首列作者或编者名，空一格，列出版年份，逗号后为征引页码。所有注释置于页下。相邻引文如出处相同，则尽量汇成一条注释，标出所有页码；如按一个页码没有检索到引文出处，请查看所列其他页码。

书目。所附参考书目，均以外文原文录写，以免翻译反生歧误。首列作者或编者名，次出版年份，次书名，末具出版地及出版者；或作者名，次发表年份，次篇名，次掲載学报，末具起讫页码；或作者名，次出版年份，次篇名，次收录书名，次编者，次起讫页码，末具出版地及出版者。此“作者—年份”格式与注释所用相应，便于对照查找。

译名。本书人名、术语众多，正文中尽量使用相应译文，仅人名、术语首次出现时附注外文原文，余则从略，以求行文流畅整齐。书末附列“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使用汉语拼音排序，读者可轻易检索并找到原文参酌。

个别译名，本人觉得旧译或有歧义，遂斗胆重译，比如，popular culture 通常译为“通俗文化”，本书则称之为“时俗文化”，以避免将文化区别与社会分层简单对应，并强调其历史特征；reception 一词，文学批评界多译成“接受”，本书借用日语“受容”（じゅよう），以强调读者的主动性，且字面比前者更具表现力。又 appropriate 一词，迄今未见通行译法，暂译为“拈借”。

杂项。书中提到欧美很多历史人名和理论流派，尽量简短介绍，但篇幅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如今互联网发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轻易搜索到相关信息，不必浪费纸墨，徒溢书价。

序言

安·布莱尔 (Ann Blair)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书籍史发端于欧洲早期近代史研究，由此上溯下及，遂蔚为大观。为此学科之建立而贡献卓著的历史学家，都曾钟情于十五世纪中期欧洲印刷术的发展及其影响，费弗尔 (Lucien Febvre, 1878–1956) 和马丁 (Henri-Jean Martin, 1924–2007) 在 1958 年出版《印刷书的诞生》(*L'apparition du livre*)，1979–1980 年艾森斯坦 (Elizabeth Eisenstein) 和丹顿 (Robert Darnton) 先后出版了他们的书籍史研究专著。在英语文学研究中，至为精细的分析目录学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研究一直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中心，譬如查尔顿·辛曼 (Charlton Hinman) 就曾逐页对比现存五十部初版对开本莎士比亚戏剧，以追究印刷中勘误正讹的方法。^①但书籍史研讨的问题，涉及文本的生产、流播、受容和存佚，涵括各种媒介、各种形制、各种语言文字、各种文体，以及复杂的历史背景。近几十年来，书籍史研究涉足的历史时段和地理范围都有很大的扩展，这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于特定时段和地方书籍史特色的认识，也增益了我们对屡见于不同历史传统的诸多书籍史基本问题的理解。比如，关于印刷的本质和历史，所有研究都强调印刷术的传播有不同的历史节奏，取决于诸多的文化、经济和技术因素。阅读史是书籍史的一个大的分支，正趋勃兴，但也特别具有挑战性。东亚书籍史中阅读

^① Charlton Hinman, *The Printing and Proof-Reading of the First Folio of Shakespea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史研究的进步，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东亚诸文化传统的了解，也增加了与其他文化传统比较研究的可能性。

在西方，研究阅读有文学批评和历史审视两种取径，戴联斌对此作了详瞻沈达的梳理。他首先追述次第出现的文学批评理论，包括新批评（New Criticism）、读者反应批评（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和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这些批评理论，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关注真实读者（real reader），与作者（author）脑海中的理想读者不同；也越来越重视文学文本多重多变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正是不同读者创立的，他们把自己的关怀和背景带进了文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历史学家首次审视近代早期欧洲留传下来的廉价印刷品，试图描述当时普罗大众的精神生活，自此便出现了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阅读行为。历史学家往往采用别样的史料，来质疑早先的历史阐释，并细检不同社会背景下的阅读行为——诸如女性和工人的阅读行为，初学者和学成者的阅读行为，上起古代，下至二十一世纪。最近的研究还指出，书籍除了阅读，还有其他的使用方式。^① 由于学科性质不一样，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研究阅读，使用的工具和探讨的问题也不同，但他们在许多大型研究项目中互相合作，很有一些成果，譬如“阅读经验数据库”（the Reading Experience Database），收罗了许多星散、孤立的史料，缀合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对历史上的阅读行为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阅读行为总是飘渺恍惚的，因为它终究是一种内在体验，其完整的影响可能稍纵即逝，即便最有自我意识的读者也把握不及；另外，大多数阅读行为并无文字记载，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无从分析。即便在批注书籍并不罕见的文艺复兴时代，英格兰流传至今的本子中大约也只有百分之五十有批注（并且有些批注还不一定是阅读书中文本时留下的）。^② 批注在内容厚重的书籍中最常见，而印制低廉、昙花一现却曾广为流传的各色文本是很少有批注的。独立成册的阅读笔记也有存世，它们在某些方面与中

① Leah Price, *How to Do Things with Books in Victorian Brita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William H. Sherman, *Used books: Marking Readers in Renaissance Engla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国传统的笔记类似。戴联斌特别关注西方阅读史家使用的各种史料，包括藏书书目、销售书目、描绘读者和阅读行为的绘画和小说，以及读书法。每一种材料都需要仔细阐释。举个例子，戴联斌指出，关于读书法的小册子，既可以用来证明当时当地倡行的读书方法，也能反证这些方法并没有人遵从，因为郑重其事地提倡一种行为，正好说明另有不同的行为正大行其道。在阅读史研究中，一个特别的挑战就是搜寻史料，以回答谁读、读什么、什么时候、在哪儿，特别是怎么读和为什么读的问题。戴联斌特别关注史料，因为这也是研究中国阅读史的一大难题。有些史料是阅读过程中直接产生的，比如边批（*marginalia*）和阅读札记；另外还有书信、文学社档案、表现阅读的图像和小说，以及关于理想藏书的文字论述、读书指南（*reading instruction*），等等。目录学和各种各样的书目则有点似是而非，很难与以上史料类型相提并论。在欧洲近代早期，有些书单只代表理想化的藏书，或是对现实藏书的讥诮；另外一些则是出于实际需要，以便追录旧藏，或在故主死后标识其藏书价值几何。^①

西方的阅读史研究，现在仍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活色生香的花边，也有一些新的创见，但坚实的理论概括还是少数，因为从多样的个人体验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模式，还是很艰难的。欧洲中世纪出现了从朗读（*reading aloud*）到默读（*silent reading*）的变化，近代早期则有从精读到泛览的转变，但在描述这样的发展时必须有所修正，须牢记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有多种阅读模式和类型共同存在，同一个个体读者，即便有自己的阅读习惯，也是根据不同的环境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识字率随时地不同差别很大。瑞典在1700年以前已经没有了文盲，因为宗教规定，年轻人要想结婚，就得识字；而俄罗斯直到十九世纪，识字率还一直不到百分之十；到了近代，欧洲人的文化水平呈现的总体特征，是城镇识字率高于乡村，男人识字率高于女人。阅读史的贡献，可能不在于社会学统计，而在于精细地分析（一）具体读者如何赋予文本以意义，（二）共同的文化实践，比如机构、群（人）际合作以及其他人类组织形式如何赋予文本以意义。当今数字媒体使用着

^① François Géral, *Figu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ans l'imaginaire espagnol du siècle d'or* (Paris: Champion, 1999).

新的技术，促生了新的社交方式，这些都在悄然改变阅读经验，我们也都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了。同样地，历史上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变革也不断地影响阅读行为，包括图书馆书籍陈列、居室中家具陈设的变化，甚至照明和交通方式也影响了阅读行为——电力的发明和火车旅行的出现，就与阅读速度的提高特别相关。阅读仍然是许许多多文化活动的核心，不管是宗教活动还是艺术活动；也是信息采集的核心，不管是新闻还是各种实用手册；更是研习各门智力学科的核心。寻求认识阅读行为在不同历史时间和地点如何演变，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历史上诸多人类经验以及文化交流的认识。戴联斌这样梳理西方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可以启发更多的中国研究专家循着类似的思路投入阅读史研究。

(戴联斌 译)

引言

这本小书不是研究西方阅读史，而是探讨西方阅读史研究的学科基础和发展状况，它的理论和方法，中心问题是为什么阅读史能在欧美成为一个学术领域，有哪些成果吸引了来自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的众多学者。理论假设和学科规范是本书要讨论的重点，这不仅是回答中心问题的需要，也是为了宏观地把握阅读史研究的基本规则，希望不仅对中国书籍史和阅读史学者有所启发，也能吸引专业外的读者。互联网时代，电子媒体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印本书籍（printed book）和其他纸媒体严重衰退，传统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以及相关的政治和法律规范也面临极大挑战。这些变革，不仅会改变社会生活，也会改变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更会挑战自有书籍以来形成的人与文本、人与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模式，进而重塑人、文化和社会的关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估阅读对于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性，而历史考察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阅读史是书籍史的一个分支，也是难度最大的一个分支。历史上的读者都已经不在人世，阅读又是一个认知和心理过程，后人很难模拟和重建。除了少数精英人物，普通读者留下的阅读记录极其稀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阅读史的理论基础还非常薄弱，现有理论框架、概念和范畴，大抵是从文学批评理论，具体讲就是读者反应批评理论（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借用的。文学批评理论往往罔顾历史环境，生搬硬套标榜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一不小心就会闹“关公战秦琼”的笑话。阅读史家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

如何调和文学批评理论和史学研究规范。研究历史上的阅读行为，首先就得设法摆脱游移在文学和史学之间的困境，这是本书最初的动因。

研究阅读史，当然得知道什么是读者，什么是阅读，但首先得了解什么是书籍，什么是书籍史。这是我们在引言里要谈论的内容。说到以书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目录学当然首屈一指。倘若追溯目录学的起源，人类对书籍的认识可谓源远流长，但书籍史成为一门学科，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这一年为“国际书籍年”（International Book Year）；1979-1980年是现代书籍史研究的起始，先是艾森斯坦出版两卷本《印刷术与近代欧洲的文化变革》（*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讨论印刷对近代欧洲文化的影响，随后丹顿出版《启蒙运动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追溯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百科全书》的出版史。^①1980年6月，来自英国、法国、西德和美国的学者在波士顿开了一次研讨会，主题就是历史上的书籍与社会。这些人会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书籍史对研究社会史极其基本，号召学者、图书馆专家和相关机构支持书籍史研究。^②1981年，美国分析目录学家谭瑟尔（G. Thomas Tanselle）发表专文《书籍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The History of Books as a Field of Study: A Paper*）；^③1982年，研究近代法国文化史的丹顿发表《何谓书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不同学科和学术传统关于书籍史学科的争论呈现在世人面前。1986年，丹顿发表《阅读史初阶》（*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提出阅读史研究模式，指出读者反应批评是阅读史的理论支撑。^④争论在所难免，因为各个学科和学术传统对书籍、书籍史、读者和阅读行为都有不同的界定和假设。这本小书不打算参与这些理论争论，只是摆摆不同的观点。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对

① Eisenstein 1980; Darnton 1979.

② Tanselle 1998, 41.

③ Tanselle 1981; 后收入 Tanselle 1998, 41-55.

④ Darnton 1990, 107-135, 154-187. 本文原掲載于 *Australian Journal of French Studies* 23 (1986):5-30.